

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陳之園（1936—2012）

2011 年，農曆兔年，我的本命年，雖然我不信邪，但又確實事事不順。始料不及的是當我準備送走這讓人心煩的“兔子尾巴”時，在短短的一周內，我先後失去了對我的人生影響至深的兩位親人——僑居在紐約的叔公陳之祿神父和我的父親。我在一天之內，奔喪於中國和美國之間，回到新加坡後，我是身心俱疲。我一直想寫些有關父親和叔公生平的一些點點滴滴，讓後代子孫有機會了解他們生活在不平凡年代里的平凡一生，但苦於雜務繁忙，加上心里久久難以平靜，故遲遲沒能如願。按我們福清老家的習俗，今年過年我得避免參與任何慶典活動，這次趁著春節假期和楓及兩個女兒駕車從新加坡北上馬來西亞金馬倫高原避年，難得清靜，就偷閒開始寫點吧。

最後一程

2011 年的下半年，叔公和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到了 12 月中，他們的身體狀況已經相當不妙，可我又不得不只身到南美洲開會，我擔心我在南美洲旅行期間他們會有什麼三長兩短，那我可就後悔莫及了，從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飛回新加坡，路上就得耗上三十多小時。我在我們每周例常電話通話中特別征求了父親的意見，他叫我放心地去。我在南美洲逗留共十天時間里，父親的病情時有反復，但每次都只是有驚無險。好在妹妹已及時從倫敦趕回老家與弟弟一同分憂解勞侍候在側，對父親精神上的安慰甚大，從而穩定了病情。

從南美洲回到新加坡後，我便馬不停蹄地攜全家按原計劃於 12 月 26 日飛回老家。當我們到家時，才知道父親的情況比想象的要糟糕得多，他已沒有自理能力，消瘦得不成樣子了。父親見到我們平安到家很是欣慰，特別是看到孫子李閩和他的女友合照時，更是異常激動，說要按家鄉的習俗，分喜糖給全村的父老鄉親。孩子們也很懂事，毫無怯色地擁抱著臥病在床的阿



公問寒問暖。李閩特意從新加坡背回他的吉他，一邊彈著一邊跟他妹妹李融和李文一起圍繞在父親床邊唱著天主教聖歌，父親的病情似乎一下子好轉了許多。

楓回到老家後，跟妹妹分擔了不少護理父親的任務，父親的吃喝和衛生基本上是她們二人輪流負責。她們倆不辭辛苦、不怕臟累，她們無微不至的照顧讓父親很感動。父親的病情似乎更加穩定並略有好轉。12月28日，父親當時的心情特別好，當他用完午餐後，我跟他聊了一個多小時，雖然父親的發音已經相當含糊，但我從他的表情和所聊的話題中，完全可以領會父親所想表達的意思；雖然父親的聽力已經很不靈光，但他基本上也可以借助助聽器和我的肢體語言理會我所說的。當我告訴父親，早上剛接到美國來的電話，叔公於12月27日（北京時間12月28日）在紐約逝世，他沈默了好一陣子後問我要不要去紐約？我說如果可能的話，我準備趕去參加叔公的葬禮。這是我與父親之間最後一次有意義的交談，接下來的幾天，我與父親的溝通大多是靠猜的，而且常常是沒有猜對。

緊接下來兩天時間，父親的病情急轉直下。2011年12月31日，父親要我們送他到鄰近的龍田鎮醫院住院，他當天的病情還算穩定，醫院為他做了全身檢查，似乎沒有什麼大的毛病，可是到了第二天，即新年元旦晚上十時左右，父親突然開始出現癲癇癱瘓狀，情況非常危急，院方要求我們自行處理，或轉院，或回家。按福清鄉下說法，老人一定要在自個兒家里咽下最後一口氣才算是有福的，所以我們決定當晚讓父親出院回家。從龍田醫院到文房村大約有十公里的路程，父親已經陷入嚴重昏迷狀態，到家後，家里的親朋、鄰里和熱心的教友已經齊聚在廳里為父親祈禱。

父親的癲癇一直沒有停止過，大約二、三個鐘頭過去，父親的心臟在慢慢地衰竭，手腳也漸漸地冰涼了。當我們絕望時，大約是1月2日凌晨2、3點時分，父親的心臟又奇跡般地慢慢恢復跳動，他的手腳慢慢有了溫感，神智開始清醒，並可以睜開雙眼望著我們，只是無法開口說話，情況似乎在慢慢地好轉。三個小孩原定1月2日趕回新加坡上學，我特別征求父親意見，問他該不該讓小孩按原計劃回新加坡，父親點了點頭，當小孩子跟他道別時，父親跟他們微微揮了揮手，眼里灑下熱淚，其實，他心里非常清楚，這是他最後一次和他的孫子孫女道別。

1月2日整整一天時間里，父親滴水不進，但他的神智相當清醒，眼睛總是睜開著，雖然說不出話來，但無需借助助聽器便可以聽明白我們的任何對話。父親認得出所有來探望他的親朋好友和鄰居教友，他跟每個人都一一揮手道別，當見到他的兄長時，他的心情特別激動，他們緊緊握著手，兩人眼里都流滿淚水。下午時分，當我告訴父親孩子們都平安到了新加坡時，父親欣慰地點了點頭。當天晚上，我們輪流守著父親，弟弟和妹妹守著上半夜，楓和我守著下半夜。當我們在3日凌晨2點交接時，父親緊緊握住弟弟的手，似乎在向他道別，當楓在他的

身旁護理時，他也緊緊握住楓的手，眼里依依不舍。沒過多久，父親的呼吸突然轉弱，3 日凌晨 3 時 8 分，父親停止呼吸，安詳地離世，享年七十七。

喪父之痛，悲從心來。哀傷之余，我覺得我其實是非常有福之人。自從 1979 年離家就讀大學之後，特別是 1986 年去了美國留學以後輾轉長期定居海外，我與父母和弟妹是聚少離多。能在父親在世的最後幾天，陪伴他走完算是完美的一生，我除了感謝上蒼恩賜之外，也感激我仁慈的父親給了我這個機會。冥冥之中，我深信父親的至愛在默默地成全著我，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身見證到人的精神力量，父親他用超凡的意誌力控制著自己生命的最後歷程，讓我有足夠時間趕去美國參加叔公的葬禮。



父親的葬禮

父親的葬禮定在 1 月 5 日，禮拜四，是天主教中歡喜日子。1 月 3 日一早，親朋好友都陸續續聚到我們家里，葬禮的一切具體事宜都由『教里』熱心的教友操辦。1 月 5 日福清天氣極其的冷，溫度幾近冰點。拂曉時分，天上開始刮起大風並下起大雨來了，我們非常著急，我的姨母，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凌晨 3、4 點就開始禱告，祈求天主降恩。可是雨還是越下越大，排放在院子里的花圈被風吹得七零八落，更讓我們憂心的是按家鄉的習俗，老人出殯的十六擡棺和送葬的隊伍是要環繞整個村一周後方可送去火化，如果碰上刮風下雨，不便之處可想而知。也許是我們的祈求感動了上蒼，也許是父親他老人家在庇護著我們，奇跡竟然真的發生了，上午 8 時左右，當父親的葬禮開始時，風雨驟然停止，葬禮的整個過程出奇的順利。更巧的是，父親火化時排到的序號是他生前最喜歡的數字 065，新加坡國際電話區號，父親所有的銀行卡密碼不是 0065 就是 000065。當我們安頓好父親的骨灰盒後啟程回家時，天又開始下起雨來了。

料理完父親的葬禮之後的第二天拂曉，我便悲上加悲地從福州取道北京飛往紐約參加叔公的葬禮。人生無常，我會終身不忘這短短幾天所經歷的兩起刻骨銘心的生死離別，我深信叔公和父親的在天之靈時刻在庇佑著我和家人，是他們的愛從精神上在支撐著我，讓我能堅強地面對這一切。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從紐約回到新加坡後的第二天，當我主持我研究小組的討論會時，電控的電腦投屏竟然前後兩次莫名其妙地自動卷起，這種現象以前和以後都沒有發生過，我在會上戲稱說這是我的叔公和我的父親給的信號，表示他們也來參加我們的會議了。

坎坷少年

我父親陳之團，本姓李，1936年生於福州城一戶李姓商賈人家，他一生極其坎坷，歷盡了人世間的興衰沈浮。父親出生時，李家家業興旺，我的曾祖父在福州城門中街一繁華地帶開設商鋪『李順記』經營角梳生意（角梳號稱是福州三寶之一），與其兄以『李盛記』為號福州著名的角梳『三發記』（李發記、李祥記、李厚記）同出一宗。我曾祖娶有妻妾三房，正房無後，二房（我曾祖母）遲遲也無子，便領養了我的祖父李一春。我祖父和祖母葉珍育有二男一女，父親是李家的大少爺，從小養尊處優，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闊少生活。李家後來家道漸落，我的曾祖父去世後，李家也由興盛轉向衰敗。

1941年日本鬼子入侵福州城時，李家舉家南逃到福清鄉下江鏡鄉一帶，我小曾祖母和她的嫡孫（我堂叔）最後落戶在江鏡鄉林厝村，我的兩位姑祖母則嫁給鄰近蔡厝村的兩個農民為妻。我祖父時在省城當憲兵，由於兵荒馬亂，自顧不暇。祖母無法獨自撫養幼小的兒女，她先是經一位天主教神父將她的幼子（我叔父）托付給長樂縣的一戶人家收養，後又將她女兒（我姑母）李秋芳寄養在福州一家天主教教會辦的孤兒院。李家逃離省城時，祖母帶著五歲大的父親一起流落在福清鄉里，為了生計，她忍痛割愛將我的父親托付給文房村的陳西祿和何金宋夫婦（我的福清祖父和祖母），自己則四處為傭。

我的福清祖父和祖母也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但他們倆菩薩心腸，都是十分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自己一生沒有生育，先後收養了從印尼回國避亂的伯父陳金堂和後來成為我伯母的陳寶宋，還有我父親以及姑母陳（林）寶玉，同時還收留年幼喪母的侄兒。我的福清祖父體弱多病，在大躍進後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活活餓死，我的福清祖母是個典型的舊中國農村婦人，裹了一雙小腳，不足三寸，一生熱心為善樂於助人，2006年10月壽終正寢，享年一百歲。

我的小曾祖母小家碧玉，也裹了三寸金蓮。在我的記憶中，她終生抽煙，在當時的福清鄉下，算是非常另類，她在我上初中二年級那年去世，逝時近九十歲。我的福州祖父在日本鬼子投降後隨民國軍隊到了臺灣，大陸解放之前，曾回閩省親並到過福清看望了父親，國共分治兩岸之後便音信全無，不知所終。我的福州祖母也是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戰亂後回到省城從事



木雕工作，1989 年 4 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我的姑母李秋芳從孤兒院出來後便和我祖母一起生活，在福州從事醫務工作，現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由於當時經手的神父早已作古，我的叔父流落到長樂縣之後就失去聯系。



我的福州祖母、父親和姑母（1988）



我的福清祖母、父親、母親和弟弟（1988）

平凡農民

父親的一生基本上與田地為伍，年輕時當過農民工，開過山，造過路，做過小買賣，打過短工，步入中年時，他在村里的一家糧食加工廠供職，但大多時間還是以拉板車為生。父親生

性聰慧，但苦於家境清貧，沒有機會受太多教育，一生只是上過半年的小學，但憑著自己的努力，平時讀報看信還是勉強可以應付。父親年輕時本可入伍當兵在部隊里發展，但因我的福清祖母擔心他從此遠走高飛，早早便為他定了親成了家，我的福清祖母和我外婆是對同母異父的姊妹。父親六十年代初就加入共產黨，其組織也有意要培養他，但因我母親極力反對，父親一輩子連中國最小的官——村官也沒當成。我的母親陳亦玉，典型的農村婦女，一輩子任勞任怨，勤儉持家，她小農意識極濃，鬥大的字不識幾個，但正是她的英明，使我們全家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場浩劫之中免於許多兇惡。



我的父親、母親和我（1965）

父親雖然沒有上過學，但在窮鄉僻壤的文房村還算是個“文化人”，在村里威望挺高的。他剛正不阿且又樂於助人，特別是在那左和右都不是人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多的父老鄉親都對那些時上時下的村幹部無所適從，無官無派的父親卻成了他們排憂解難的首選之人。在別人互相鬥得要死要活的時候，父親為了養家糊口選擇了做些小本生意，他每天起早貪黑翻山越嶺四處叫賣，換來的薄利勉強可以維持家里生計，這在那人不人鬼不鬼的年代，已是相當難能可貴了。做小生意固然辛苦，也時時冒著被當成投機倒把分子給逮起來的風險，父親卻因此躲過了文革期間派系爭鬥中的許多是是非非。

在文革後期，中國的社會相對穩定了些，但大多農民就是一年到頭沒時沒日在田里勞作，所得所獲也無法填飽自己的肚子，可憐的平民百姓幾乎個個是食不果腹，面黃肌瘦。父親當時在村里的一家糧食加工廠供職，有時他會趁著工作之便，廉價弄些麥皮等一些粗糧回來，母親會將這些所謂的粗糧拌些野菜給全家人改善生活，讓我們時常有“吃飽”的感覺，這在當時似乎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全托這些健康食品的福，讓我曾經也苗條過，記得在我十五歲大學入學

體檢時，我的體重只有四十多公斤，身高一米五八。沒想到時過境遷，這些連豬都懶得吃的粗糧野菜，現如今卻成了許多達官顯貴們桌上的美味佳肴。

不是很久以前，文房村前一列排開如同筆架的五座石頭山中還有很多石頭，當時采石在村里算是一大產業，采下來的石頭被加工成建築材料後源源不斷地供給鄰近的村落，有的造房，有的修墓。父親和母親的另一副業便是拉板車，用板車幫人家運送石材，有時路途比較遠，來回一趟要一整天，所以他們每次都會盡量將板車裝得滿滿的，有時還不得不叫上我和妹妹跟著幫忙推車。說實話，我算得上懶人一個，為了逃避勞動，我平常都裝著很用功讀書，雖然在那年頭除了毛選外，也沒啥書可讀。可是這推板車跑長途的事情我還是比較樂意幹的，因為每次這個時候我都可以在房東家吃上一頓飽飽的地瓜稀飯。記得有次在我放開肚皮大吃特吃時，女主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唯恐我吃得太撐了，但她嘴上卻一直在誇我：這孩子個頭不大，飯量可真不小啊。記得還有一次回程的路上由我掌舵空車，途經一大斜坡時，由於下坡加速和我人小身輕，我整個人便飄了起來，雙臂浮掛在車前的拉桿上，兩腳懸空，車子幾乎完全失控，差點沒把坐在車上的老爸老媽一起掀翻到坡底的深水塘里；每每憶起都有些後怕，要不是在最後的一剎那，我的雙腳神使鬼差般地落回到地面上，我恐怕是早已在閻王府上當差了。

父親是個孝子，他對分別居住在福清鄉下和福州城里的兩位母親之間的愛是平等的，所以他特地為弟弟取名“福平”。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每隔一兩年都會帶上許多我們鄉下的土特產到福州城里探望祖母，並同祖母和姑姑一家一塊過年，每次他都會帶上一兩個小孩跟著他。從文房村到福州城，有一百五十多里，路面崎嶇不平，為了省錢，父親一般都是騎著自行車進城的，路上一般要花上七、八個小時。雖然我們坐在自行車後座一整天挺難受的，但能跟父親進城過年是件很幸福的事情，除了有好吃好喝好玩之外，還可以見識許多平時聞所未聞的東西。我是個地道的鄉巴佬，記得當時我是見什麼都新鮮，一路上總是沒完沒了地問父親這個那個的，父親總是非常有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由於我的問題大多都是莫名其妙的或是無中生有的，害得他有時不得不搜腸刮肚或臨時編些答案來應付我。

父母親先後生下了我，妹妹月玲和弟弟福平，我們仨都已成家立業並各育有三個兒女，由於父親原來李姓，他的六個內孫全數復姓陳李。在我小的時候，執政者時而神經錯亂、時而顛倒是非，鼓吹讀書無用，全國的教育系統幾乎癱瘓，那時大多的農村孩子在學校里混了幾年父母便會讓他們輟學回家幹活。父親是個開明的人，打我和弟妹三人懂事起，他就跟我們約法三章，只要我們在學校里混得下去，只要不留級，只要我們願意讀書，他就會讓我們一直在學校里呆著。感謝上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黑白顛倒的中國社會總算又倒回來，父親不懈的堅持沒有白費，我和弟弟最終上了大學，妹妹也有機會上了衛生護理學校，父親自己一生未了的夙願算是有個圓滿的結局。隨著中國社會制度的變革，父親和母親八十年代初便在村里經營了一爿雜貨鋪，家里生活也漸漸有所起色，我們不用再餓著肚子過日子了。



父親、母親和兒女們（2011）

南洋之旅

父親和母親是 1994 年底來到新加坡的，當時我們剛剛添了老三陳李文，他們的到來不單減輕了我們照料孩子的負擔，也給孩子帶來了許多天倫之樂，仨小孩如今能說那幾句福清方言大多是跟父親和母親學的，孩子們在潛移默化之中也漸漸地意識到遠在中國的福清老家是他們的根。父親的適應能力很強，他很快就熟識了新的環境，經常一有空便騎著腳踏車四處溜達。父親待人熱誠，很樂意幫助從家鄉來新加坡打工的鄉里鄉親，他也喜歡參加一些社團活動、如新加坡福清會館和福州會館的聚會和新年團拜等等。也許是勞碌慣了，父親總是閑不住，老想出去打點零工為我們減輕些生活負擔，他先後在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園里的學生餐廳做過幫工，有時還起大早挨家挨戶派發報紙。

也許是過度勞累，1997 年 3 月的一天早上，父親在去上班的路上突然暈倒，後來在國大醫院被診斷出患上晚期鼻咽癌，父親對這突如其來的厄運坦然處之。在好友林醫生的建議之下，我們決定讓父親回國到福建省腫瘤醫院就醫。福建和廣東兩省是全國鼻咽癌高發病區，醫生見多識廣，視鼻咽癌如同重感冒一般。父親的心態很好，該吃時便吃、該睡時便睡，雖說是晚期癌癥患者，精神卻相當樂觀。父親的治療效果似乎不錯，自從腫瘤醫院出院後到他去世這十多年的時間里，他再也沒有踏入過腫瘤醫院半步。父親分別在 2008 初冬和 2010 年歲末曾兩次入住福建省協和醫院，一次是為了治療嚴重的高血壓，另一次則是為了切除腦部一良性腫瘤。也許是因為腦部手術的後遺癥，父親從此元氣大傷，導致他最後病逝的主因就是腦部衰竭和高血壓。



新加坡虎豹別墅（1995）



全家福（1997）

黃昏歲月

父親晚年時的生活很有規律，除了在自家的大院里做些運動外，大多時間花在打理屋旁的菜園和花圃，有時還幫村里的教堂管管賬。父親還喜歡旅行，我是在 1999 年夏天與父親一同到武夷山呆了整整一周，父親那時大病初愈，但精神和精力都算恢復得挺不錯。當時武夷山的民風相對比較純樸，位於崇陽溪旁的風景區和保護區還尚未被聯合國接納為世界自然和文化遺



產，崇陽溪溪流潺潺，綠水環山，保護區里竹林遍野，特別雨過天晴時、四處煙霧裊裊，如同人間仙境。最有意思的是當我們驅車前往武夷山脈的主峰華東第一高峰黃崗山時，父親認定從武夷山市到江西交界的山間公路是他年輕時當農民工時參與修的，由於崇山峻嶺道路崎嶇，公路竟然還基本上保持了當時的原貌，在一懸崖峭壁的拐彎處，父親還清楚地記得那是他當年險些遇難的地方。我不禁嚇出一身冷汗，若是父親那時就命喪黃泉，那麼今生今世誰又是我？



武夷山大王峰（1999）



廈門鼓浪嶼（2001）

2001 年 6 月，在我忙完了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之後，父親從老家到廈門陪我小住了幾天，然後我們一起飛去逛了一趟北京，為了方便，我們選擇入住位於北京中心地帶的王府

井大飯店，並先後遊覽了毛澤東紀念堂，頤和園，天壇和故宮等景點。記得遊故宮時，我們去禦膳房吃了碗面條，父親很開心，那天晚上他沒睡上幾個小時，天還沒亮他便獨自到王府井天主教堂去望彌撒。想想也是，像我們這樣生活在窮鄉僻壤的福建鄉巴佬，天高皇帝遠，還動不動就被人擠到海里漂到海外，哪里敢想在皇帝的食堂里吃頓飯，在老兒的家里撒泡尿？我還帶父親到清華園拜訪了我的好友鄭教授和宋教授夫婦，最後我們去了長城和十三陵。特別要提的是明十三陵中唯一被挖空的定陵，其主人萬歷皇帝在我們老家幾乎是家喻戶曉，父親對萬歷老兒也是如數家珍。萬歷後期的內閣大學士便是福清人士葉向高，此君在萬歷的昏昏噩噩醉夢朝中獨自為相十余載，在家鄉流傳至今的八卦故事也特別的多。

受好友冯教授之邀，我於 2005 年 7 月到香港城市大學做短期學術訪問，我順便也帶上父親一同前往。在香港逗留期間，父親對海洋公園和星光大道印象都不深，大多都是在走馬觀花，唯獨對在香港太平山頂的那頓晚餐念念不忘，其中一碟一百多港元的空心菜更是讓他耿耿於懷，要知道一百多元足夠讓他和母親在鄉下開銷個把月。好在每次同我出遊，父親對我的大手大腳的花錢習慣基本上是不聞不問，懶得理我，要換成是母親，我早就會被她罵得狗血噴頭。遺憾的是母親天生會暈車暈船，加上腿腳不利索，很少願意跟我們一起到處瞎折騰。



香港維多利亞港（2005）

當我們去澳門探望我的表妹時，我是自然不會放過到賭場去賭一把的機會，那天我的手氣特別好，玩了幾手 21 點便有好幾百港元入賬，正當我要大展拳腳的時候，父親硬是把我拉出賭場。那天我們特開心，我們叫了一輛的士把澳門大小角落都跑了一遍，然後跨過邊境在珠海



找家最好的酒店住下。我的表妹，我舅舅的女兒，也是一個典型被擠到海里漂到海外的例子，她先是以勞務合同工來澳門的，後來便就地定居安家，現在澳門葡京賭場擔任一個部門主管。



香港太平山（2005）



澳門大山巴（2005）

父親平時一直念叨，很想去趟上海，看看那里的花花世界。2011 年 5 月我趁著去臺灣高雄和四川綿陽參加學術會議的空隙，拐回老家帶著父親和舅舅從福清乘坐動車到上海。父親在動了腦部腫瘤切除手術之後，整個身體狀況就大不如前了。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父親已經沒有多大興趣和精力去欣賞所謂的美景，如世博園，南京路，城隍廟和東方明珠等等，更多的是好像在完成任務。由於時間緊，原本打算在上海逗留三天後，他和舅舅便飛回福州。也許他已經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十分堅持要我擠出一天去南京，我們最後還是去了南京的中山陵和總統府，他當時已經沒有力氣爬完中山陵的三百多級臺階了。



上海東方明珠（2011）

其實，父親特別想去的地方還有臺灣，因為在那里某個地方葬有他印象模糊客死他鄉的生父。父親在彌留之際的前幾天，還特意要弟弟開車載他到平潭島海邊走一趟，平潭島緊挨著福清半島，與臺灣海峽對面的新竹市隔海相望，是中國大陸距離臺灣最近的一塊陸地。

未了心願

父親心里最放不下就是堆積在文房村前的垃圾，自 2008 年起，從江鏡鎮各村收集到的垃圾和廢物就被源源不斷運來文房堆積在村前的石頭坑里，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垃圾，極易殃及到村民賴以生存的地下水源，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天，垃圾孳生的大量蒼蠅和臭蟲四處為害，方圓幾里皆可聞到沖天的臭氣。中國的百姓，天性善良且逆來順受，文房村里父老也不例外，因為擔心受到打擊報復，他們大多都選擇保持沈默。

父親一向剛正不阿，又是個犟老頭，為了鄉里鄉親，他抱病層層上訪，與當權者據理力爭，可是得到的結果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典型官式回復，當父親在投訴無門後叫來記者採訪時，山

頭上便會出現大量機械推土掩蓋骯臟的垃圾，當記者離開時，運廢物的車輛便照樣浩浩蕩蕩地繼續開來。父親在辭世之前，他最後一天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跟我交代的最後一件事便是有關文房村前的垃圾，父親臨終時還念念不忘，放心不下，要我想想辦法解決文房村的垃圾問題。父親，您安息吧！我會常常為我們文房村祈禱的。

仁慈的父親，願全能的天主與您同在！

陳本美

2012 年 1 月 23 日初稿於馬來西亞金馬倫高原

2012 年 2 月至 12 月期間續稿於飛往世界各地的航班途中

2013 年 1 月 3 日於新加坡由何楓修改後定稿